

试论年鉴实用性与编纂目标的统一

——年鉴使用情况的调查思考

高曙明*

摘要 年鉴进入中国以后,其功用被逐渐认识。随着全国两次年鉴创编热潮,年鉴读者群已基本形成。目前年鉴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大多编纂者是从年鉴自身特征如工具性、传播性等角度认识问题。现实中的读者群以及实际发生的读鉴用鉴行为是否与编纂目标所描述的使用对象、使用价值相一致,尚无探索和验证。以《宁波年鉴》为例,通过对读者群、年鉴使用情况的调查进行分析,发现年鉴使用者更广泛、使用渠道更多样以及实际影响力达到甚至超过原设定要求。因此,年鉴“编”的目标要紧跟“用”的实践,“用”的经验反过来会对编纂行为提出合理化建议,两者不断融合促进。年鉴工作进入新时代,进一步打造高质量的年鉴成果,迫切需要 will 编纂和使用一同筹划,从理念和行动上使“编”“用”并举落到实处。

关键词 年鉴使用 实用性编纂目标 读鉴用鉴

现代意义上的年鉴传入中国之后,被赋予了区别传统地情资料书之外的价值,读者数量逐渐增加。如《申报年鉴》提出的“以月刊辅日报,乃又益之以年鉴,俾日报月刊为经,年鉴为纬”^①,方便治史者“得日报为之备载无遗,月刊为之征引提举”^②,发挥年鉴“统计史表”^③作用,三者相得益彰,无“挂漏之虞”“繁琐之患”^④,构成体系。对于此新生事物,当时地方年鉴编纂者甚至认为“洵足补史志之不及矣”^⑤。还有说“不第可以代志,其价值当

* 高曙明,男,浙江省宁波市人,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年鉴处处长、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年鉴学、方志学、地方文献学。

① 史量才:《申报六十周年发行年鉴之旨趣》,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全编》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10~11页。

② 史量才:《申报六十周年发行年鉴之旨趣》,第10~11页。

③ 史量才:《申报六十周年发行年鉴之旨趣》,第10~11页。

④ 史量才:《申报六十周年发行年鉴之旨趣》,第10~11页。

⑤ 李颖:《30年代中国年鉴学思想初探》,《年鉴信息与研究》1999年第2期。

过于志书也”^①,体现了读者群对其较高的认可程度。因年鉴有别于其他体裁,其聚焦于一年时限,以面维系厚度,优势在于反映“一年”为截面的发展全貌。章学诚论述的修志“二便”之“时近则迹真”^②,如套用在年鉴上则是及时的真实记录。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年鉴创编的第一次热潮,年鉴在知识更新、“知识爆炸”背景下成为与时代同步的大容量信息载体,与现实读者群更为贴近。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后,地方综合年鉴纳入地方志工作范围,特别是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并明确“两全目标”,地方综合年鉴创编迎来第二次热潮。《规划纲要》中阐述年鉴读者群范围为党政机关、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

近年来,年鉴读者群与年鉴编纂开发利用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有多篇论文谈及年鉴如何被使用、怎样面对使用者等课题。如莫秀吉提出,从内容与传播方式结合、编纂者与使用者结合、为现实服务与存史功能结合等视角,将年鉴办成有用、好用、宜用、乐用的权威性工具书;^③葛民《年鉴的工具性特征及其实际使用倾向》从情报性、权威性、可读性、便览性、检索年度资料性、宣传性等特点分析读鉴用鉴需求,涉及相应人群有教师、科研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等。^④其他如周训安《年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意义及助力探究》^⑤、邓水燕《地方综合年鉴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点思考》^⑥等均在具体用鉴领域开展研究。但是,总的来说,读鉴用鉴以及读者群研究的关注度总体仍不够,且研究者多聚焦于涉及年鉴本体编纂方式在用鉴中的问题(如调整记述内容、框架结构、资料来源、出版时效)、年鉴本体传播方式在用鉴中的问题(如制作简本、外文版、网页版、数据库版、手机APP版、微信小程序版和扩大发放范围等)。有的谈到如核对资料、查找出处、编纂图书等使用途径案例,但原则性、指导性研究较多,倾向于单线性判断或主观设定读鉴用鉴情况,真正触及读者群使用年鉴反馈情况研究的则较少。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一次年鉴使用或读鉴用鉴调查来了解实际情况,从而辨析读鉴用鉴与编纂目标的关系。

一、年鉴使用以及读鉴用鉴群体的实证调查

年鉴界有关此类调查启动较早,其中《上海年鉴》编辑部策划,围绕读者群构成、年鉴认知、年鉴评价等方面开展的一次读者问卷调查活动,提出年鉴“未来发展之道”^⑦,影响

① 三门县政府:《三门年鉴》(民国32、33年合辑),台州三门县政府印,1944年。转引自徐鹏:《民国时期浙江年鉴编纂出版述略》,《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7期。

②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23页。

③ 莫秀吉:《年鉴实用性述论》,《中国年鉴研究》2017年第2期。

④ 葛民:《年鉴的工具性特征及其实际使用倾向》,《图书馆学刊》1989年第6期。

⑤ 周训安:《年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意义及助力探究》,《新西部》(理论版)2017年第2期。

⑥ 邓水燕:《地方综合年鉴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点思考》,《福建史志》2018年第6期。

⑦ 沈思睿:《年鉴,为谁而编?》,《社会科学报》2015年2月12日。

很大。为便于实际应用,宁波市结合《宁波年鉴》情况,开展了一次年鉴使用以及读鉴用鉴群体的综合调查。调查方式主要是使用情况的分类汇总、已发表文章的内容整理等。该年鉴创刊于1998年,自首册1997年卷至2019年卷,已出版23册,累计字数3040万,计条目4.7万个、表格2200余个、随文插图2400余幅。其纸质版发行范围主要是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全国和省、市、高校等各级各类图书馆,街道、村(社区)阅览室等;电子版发行载体有网页栏目(网站数据库或电子书)、多卷本光盘版、随书单卷本光盘版、U盘版以及录入中国知网等。

从现有的调查情况看,曾使用或经常查阅《宁波年鉴》的读者群体主要分两个大类11个小类。

(一)单位

1. 党政机关、各部门

主要用途:作为历届市领导的工作用书;作为撰写综合材料的基础资料(重点关注数据类内容);作为全国重要会议上宣传展示城市形象图照的主要资料来源;运用于专项工作的基础资料等;各部门重要宣传纪念活动的基础资料;服务双拥工作,赠送驻甬部队等。

2. 开发区、功能区

主要用途:作为开发区、功能区管委会拟落地投资项目了解市情、编写意向书的基础资料等。

3. 科研院所

主要用途:作为承担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大研究课题任务的基础资料等。

4. 展览场馆

主要用途:作为城市展览馆重要布展使用图照的资料来源、参观陈列用书等。

5. 城市街区景观开发单位

主要用途:作为主要道路建设指挥部、街区开发投资企业设置大屏幕宣传城市的基础资料等。

6. 交通设施建设、设计、维护单位

主要用途:作为规划设计单位用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市政桥梁管养系统等设计工作的基础资料等。

7. 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

主要用途:作为馆藏图书供读者借阅。

8. 公共信息亭建设单位

主要用途:作为主要信息内容提供来源,供市民查阅。

(二)个人

1. 高校学者、各类研究人员

主要用途:通过查阅中国知网,初步统计历卷《宁波年鉴》被论文作者引用情况,总数约有30篇以上。其中,列入随附的“参考文献”有《近50年来浙江宁波地区高温期水热变化研究——以宁波市鄞州站为例》《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宁波对外开放》《宁波利用外商

直接投资面临的困难及主要对策》《城市节庆活动的文化表达实证研究——以宁波服装节为例》《宁波能源与天然气建设的策略探讨》《宁波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经济分析》《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合作——浙江省宁波市的案例》《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研究——以宁波市海曙区为例》《对宁波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调研分析》《宁波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特点及其成因剖析》《宁波广播电视事业发展30年》^①等。

从具体引用方式看,其一是以数据类为主体。有直接使用单一年鉴数据的,如张育斌、王静、王美姣《宁波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问题及发展对策》在“摘要”中点明,“本文通过对宁波年鉴统计数据 and 调研方式……”^②;童鑫斌《宁波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研究》说明“其余年度的数据均来自中国商务年鉴或宁波年鉴”^③;梁波、刘玉照、王海英《早期工业化模式对外来农民工待遇制度范式的影响——以宁波市为例》页下注,“根据《宁波年鉴》(1995年)的数据整理”^④;王诗宗《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正文中,“每人支付成本”数据页下注“2003年宁波年鉴”^⑤;李瑞、刘建中《港口旅游发展研究进展与实证——以宁波港为例》直接在正文中括注其中一段数据来自2009卷年鉴。^⑥有数据制表的,如蒋力《1996—2004年宁波市私营企业的发展特点分析》利用多年年鉴数据编制《1996—2004年宁波市私营企业户数发展情况表》^⑦;冯游辉、杜阳虹《宁波海洋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灰色关联度分析》制作《宁波市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及涉海信贷余额(2009—2011)》^⑧;张颐《宁波企业对外直

① 林德根、郭浩、王静爱、史培军:《近50年来浙江宁波地区高温期水热变化研究——以宁波市鄞州站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年第2期;乐承耀:《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宁波对外开放》,《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姒依萍:《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的困难及主要对策》,《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戚能杰:《城市节庆活动的文化表达实证研究——以宁波服装节为例》,《改革与开放》2010年第2期;王维周:《宁波能源与天然气建设的策略探讨》,《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曾雄飞、伍伍玖:《宁波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经济分析》,《江苏环境科技》2007年第1期;王诗宗、费迪:《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合作——浙江省宁波市的案例》,《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4年第3期;吴玉霞:《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研究——以宁波市海曙区为例》,《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陶云飞:《对宁波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调研分析》,《华东经济管理》2003年第4期;陆智峰:《宁波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特点及其成因剖析》,《华东经济管理》2006年第4期;郭鉴:《宁波广播电视事业发展30年》,《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② 张育斌、王静、王美姣:《宁波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问题及发展对策》,《价值工程》2015年第8期。

③ 童鑫斌:《宁波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研究》,《经济论坛》2008年第13期。

④ 梁波等:《早期工业化模式对外来农民工待遇制度范式的影响——以宁波市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8年第6期。

⑤ 王诗宗:《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07年第4期。

⑥ 李瑞、刘建中:《港口旅游发展研究进展与实证——以宁波港为例》,《经济地理》2011年第1期。

⑦ 蒋力:《1996—2004年宁波市私营企业的发展特点分析》,《宁波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⑧ 冯游辉、杜阳虹:《宁波海洋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灰色关联度分析》,《现代商贸工业》2014年第24期。

接投资浅析》附表《宁波对外投资金额统计》是“根据 2002—2005 宁波年鉴整理”^①；江怡《宁波实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思考》附表《宁波 2010—2012 年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水平对比》是“根据《宁波年鉴》有关数据整理”^②。有多地年鉴数据对比的，如鲁兴启、任向超《关于宁波市科技创业政策法规环境建设的探讨》附表《2012—2013 年宁波、杭州、深圳 3 市 R&D 经费投入对比》^③；王丹、谭啸《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在示意图“2004 年辽宁沿海经济带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经济指标比较”中使用“2005 年宁波年鉴”数据；^④李增蔚、叶俊《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预测及发展建议》在货物吞吐量表中使用两地“2005—2013 年”年鉴。^⑤

其二为表格类。分为两种，除了前文提到的数据制表外，另有正文内容再加工整理的，如李梦莹、管清琨、刘焕庆《国内海洋节庆旅游现状分析及建议——以中国开渔节为例》将多年卷年鉴数据整理成汇总表——《中国开渔节主要活动》^⑥。

其三为条目类。如朱金生、徐宏慧、王球《我国医疗卫生行业 FDI 模式选择的产业影响因素——基于灰色关联的实证分析》指出，其“中外合作医院的案例来自《宁波年鉴（2007）》医疗卫生管理，‘甬上首家中外合作医院签约’”^⑦；张奎方《地籍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引用《宁波年鉴（2006）》条目“国土资源管理推进地籍信息化建设”^⑧。

2. 媒体从业者

主要用途：作为媒体记者撰写新闻稿的基础资料。

3. 普通市民、网民

随着网络化、数字化的应用，读鉴用鉴条件更加便捷。尽管此次调查无法做到事无巨细，作为普通市民或者其他临时查阅的情况还无法完全掌握，一般认为以查找基本市情、便民信息、出台政策内容的较多。

二、读鉴用鉴情况与编纂目标的紧密关系

开展读者群以及读鉴用鉴情况调查是为了更好地明确编纂目标和定位。关于年鉴编纂目标或者宗旨，《地方志工作条例》第 6 条对包括地方综合年鉴在内的地方志成果要求，“应当做到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① 张颐：《宁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浅析》，《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 期。

② 江怡：《宁波实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思考》，《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15 年第 1 期。

③ 鲁兴启、任向超：《关于宁波市科技创业政策法规环境建设的探讨》，《科技管理研究》2016 年第 4 期。

④ 王丹、谭啸：《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商界·下半月》2008 年第 11 期。

⑤ 李增蔚、叶俊：《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预测及发展建议》，《物流技术》2015 年第 5 期。

⑥ 李梦莹、管清琨、刘焕庆：《国内海洋节庆旅游现状分析及建议——以中国开渔节为例》，《经营管理者》2015 年第 3 期。

⑦ 朱金生、徐宏慧、王球：《我国医疗卫生行业 FDI 模式选择的产业影响因素——基于灰色关联的实证分析》，《经济管理》2013 年第 4 期。

⑧ 张奎方：《地籍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3 年第 4 期。

会的历史与现状”^①,一般其主体大致包括记述范围、功能作用、框定读鉴用鉴范围等。各地各年鉴也基本都会在编辑说明中载明读鉴用鉴对象和作用,由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编纂目标的确立与读鉴用鉴息息相关。如编纂目标中提到“为社会各界了解和研究提供深圳基本资料”^②、“为各级党政机关、研究部门、社会各界人士,以及中外投资者认识、了解和研究成都提供基本资料”^③、“为科学决策、指导工作提供可靠依据和最新信息;为开展教学和思想教育提供纪实资料和市情教材”^④等。

以上几种年鉴编纂目标中“读鉴用鉴对象”部分进行了宽泛表述的有“读者”,细分的有各级领导和党政部门等,个别提到了运用于学术研究者、经济投资主体等。读鉴用鉴具体方式大致有提供基础地情资料、参考判断依据、年度资讯信息等。《宁波年鉴》编纂目标为“逐年记载宁波市范围的新事物、新成就和新经验,为执政提供借鉴,为发展开创思路,为历史留存资料”^⑤,体现了资政、存史价值,也大致确定了读鉴用鉴群体。通过分析此次调查结果与编纂目标内容,可以发现年鉴需求者与年鉴编纂目标的调整有一定关联性。

一是通过读鉴用鉴调查结果与编纂目标对照,可知读者群覆盖均比较广泛。年鉴为中心工作服务,也为其他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服务。年鉴资料既能在实践中直接调用,也能被理论研究者所看重,显现其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的属性。这是阅读对象对年鉴认可的重要表现。编纂目标确定的“提供借鉴”“开创思路”“留存资料”在各个读者群中基本得到了反映。

二是通过读鉴用鉴调查结果与编纂目标对照,可知实际利用年鉴的途径、方式更多样。按使用手段分类,有原文引用大事记内容、借用图表元素、查询基础性信息、资料整理再造、对比其他文献参考、公众信息平台发布等,说明在读者群中对如何使用年鉴已相当熟悉。读者除了关注编纂目标中“新事物、新成就和新经验”,如“首个”“第一”内容,对其他历年性资料也有需求。

三是通过读鉴用鉴调查结果与编纂目标对照,可知年鉴实际影响力基本达到甚至超过原设定要求。年鉴价值不断被认知,已经形成长期稳固的读者群、用鉴群。据了解,年鉴初次使用者在接触年鉴后,即被其全面庞大、权威有效等信息特质所吸引,认同“问基本市情查年鉴”,并向周围同行推荐。同时,具体编纂行为落实了编纂目标中的“为执政”“为发展”“为历史”,进一步推动了年鉴利用率的上升。

三、如何实现年鉴编纂目标与读鉴用鉴的协同

目前,全国正在推进地方志事业包括年鉴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年鉴工作进入新时代,

① 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5月18日。

② 深圳年鉴编纂委员会:《深圳年鉴(2018)》,“编辑说明”,深圳市史志办公室,2018年。

③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成都年鉴(2018)》,“编辑说明”,成都年鉴社,2018年。

④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武汉年鉴(2018)》,“编辑说明”,武汉年鉴社,2018年。

⑤ 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宁波年鉴(2018)》,“编辑说明”,宁波出版社,2018年。

始终要求我们增强年鉴事业进一步提升突破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年鉴编纂成果要及时记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每一个脚步,激发每一位中国人的政治认同、道路认同、理论认同、制度认同、文化认同,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助力新时代改革开放。这将进一步推动在人民群众、各行各业中广泛读鉴用鉴,扩大年鉴读者群。要使年鉴编纂目标更明确、更有根基,必须要努力增强、扩大年鉴的服务功能,要收录反映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使之能够走近寻常百姓。年鉴工作者不仅要关注读鉴用鉴群体,而且设置编纂目标也要呼应年鉴使用者的关切。要改变过去年鉴只抓编纂一头,忽视年鉴使用、读者反馈工作,或以编辑行为质量水平代替年鉴整体质量水平。要在编、用之间把握平衡,促进读鉴用鉴效果反作用于编纂目标的确立、修正。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实践中通过读鉴用鉴准确定位编纂目标,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第一,年鉴使用与编纂目标要放在同一体系、同一节点考虑。在调查中发现,用鉴者对数据有连续性记载需求、对动态性条目有跟踪记载需求、对新事大事记载相对敏感等。在每卷年鉴编纂启动时,应该将读鉴用鉴需求调查一并谋划,虽可能增加编鉴的整体时间,但将编纂目标具体化有利于年鉴编纂的过程更有效率、成果更有针对性。编纂目标也可以鼓励更多的读鉴用鉴行为。同一体系内即编纂、使用是相互印证、总体协调、高度关联的,这是新时代年鉴发展的高标准、高要求。同一节点即不能将两者简单分开,不能有先有后。编出来后再做年鉴宣传,认为“年鉴出版发行了就是有用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二,年鉴使用与编纂目标要步调一致、有始有终。年鉴编纂特别是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机制主要是由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织参与,合力实现编纂目标。其引导下建立的框架结构、选题原则、语言风格、图表编排、彩页设计等服务于这一个“指挥中心”,全力调动所涉及的内、外部资源。而读鉴用鉴作为实施中的客观绩效体现,有助于推动年鉴读者群要求得到更好呼应,使所入选事物标准更清晰、准确,两者应是一致的、同向的。根据读鉴用鉴调整完善后的编纂目标应彻底执行,使编鉴、用鉴在计划和落实上有头有尾,不能因为需求有难度、编纂有困难就应付了事。如数据问题,年鉴初稿往往是初步数据,用鉴者需要的准确数据要延迟几个月,这就要求编纂目标确定选取底线,编纂人员也要细致到位。

第三,年鉴使用者(读者群)与编者要定期互动,“如何使用”“怎么编纂”要有沟通。国内大部分年鉴出版后,一般是确定纸质版发送范围,将电子版发行于不同网络载体,尽快向社会推送年鉴内容。读鉴用鉴需要年鉴编纂者对内容详细解读,因此建议另策划编辑一部《年鉴使用手册》。该手册涵盖年鉴体例说明、信息结构特点、年度重点内容记述简介等,增强二次文献特征,将近几卷纲目调整情况、索引重叠词等制图说明。在确定编纂目标和具体编纂过程中,“用鉴者介入”很少被提及,双方沟通也几乎没有。如普通市民、研究机构学者等群体各需要什么年鉴内容、记述上有什么要求,基本上是编纂者主观猜测为主,因此年鉴编纂人员要最大限度地开展交流及调研。编、用要加强往来,其中征求纲目意见、定期座谈、邀请专家学者参与编纂年鉴或者直接撰写文稿等均有效的沟通手段。

四、结 语

通过此次调查,宁波市基本摸清了以往读鉴用鉴问题研究中的模糊地带,即如何在具体实践中“真实地”运用年鉴成果,并在大量案例基础上对使用对象和使用情况进行较为详细的归类梳理。经过结果分析,以编纂目标为核心的整个编鉴行为,与信息查询、提取、对比等为主要方式的读鉴用鉴行为,两者存在目的趋同而达成的相对一致性。但两者对内容取舍方向也有一些疏离,如重数据表达还是重事实记述,是否关注延续性条目等。

因此,推动编用协同研究有实际业务指导和认识上的意义。其一,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年鉴事业,要树立年鉴不能为编而编,而要树立为使用、推广、服务而编的理念。在年鉴价值判断上,广泛且快速发布或传播年鉴,提供使用指南,促其尽早发挥作用远比传统认为的存史更为重要。其二,要坚持编用一体化设计,强化和丰富读鉴用鉴带来的外来养分,提升全书总体质量。“管编不管用”反映目前年鉴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能仅追求年鉴本体所谓的精品。纲目调整、条目选题、图表配比等方面都可以体现使用者的反馈力量。其三,要继续开展读鉴用鉴群体和行为的细分研究,打造完善、融入的年鉴生态圈。随着社会对知识产品和服务的认可度提高,年鉴使用群体正在逐渐扩大,使用行为也呈现不断增长甚至跨领域的变化,要能够提供精确的信息达到精准服务,了解谁在使用、怎么使用等情况极为重要。笔者虽做了些思考,但还是有不少问题需要再深入探讨和阐述,如编、用谁主导,如何形成比较完善的机制;实现编前有效沟通、编后有效使用的量化评价标准是什么;能否进入评审体系等。

责任编辑:杨卓轩